

〔印〕阿·库·穆霍帕德希亚 著

西方政治思想概述

姚 鹏 张 峰 王伟光 译 葛 力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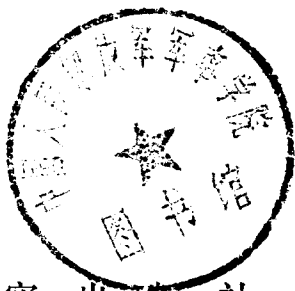
求 实 出 版 社



教研参考

西方政治思想概述

〔印〕阿·库·穆霍帕德希亚 著
姚 鹏 张 峰 王伟光 译
葛 力 校



求 实 出 版 社

西方政治思想概述

〔印〕阿·库·穆霍帕德希亚 著

姚 鹏 张 峰 王伟光 译

葛 力 校

*

求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 印张 150 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50册

书号: 3231·183 定价: 1.00 元

(限国内发行)

627-481.7

出版《教研参考》的说明

为了促进党校的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我们计划选择一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著作、译作、论文、资料，作为教研参考用书，陆续出版，供各级党校参考。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在选编工作中，难免会有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求实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五月

译者前言

本书原名《西方政治思想——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加尔各答巴格奇公司1980年出版,原书为英文本),作者阿·库·穆霍帕德希亚,是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教授,著有《臣民伦理学》、《当代印度社会和政治》、《社会政治学》和《孟加拉思想传统》等书。

由于考虑到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概略地叙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及其渊源的通俗著作,所以我们把它的中文译本改名为《西方政治思想概述》,并在内容上作了必要的删节。

本书对于西欧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历史背景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并给予一定的分析批判,既有深度,又比较通俗易懂,可供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同志阅读,也可供有关的理论工作者参考。

本书译文承蒙葛力教授亲自校正,谨此致谢。

译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

目 录

第一章 寻求和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1)
第二章 以法为据	
——罗马政治思想·····	(44)
第三章 不虔诚的信徒	
——中世纪政治思想·····	(57)
第四章 前进的历程	
——从马基雅弗利到布丹·····	(85)
第五章 资产阶级政治的开端	
——十七世纪英国革命 霍布斯和洛克·····	(111)
第六章 人民的呼声	
——卢梭的两面性·····	(133)
第七章 新利维坦	
——黑格尔·····	(150)
第八章 机器的魔力	
——从亚当·斯密到约·斯·穆勒·····	(163)
第九章 并非真正的共同善	
——托·希·格林·····	(192)
[附]:	
——参考书目·····	(210)

第一章 寻求和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西方政治思想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此后的发展大都因循这两位伟大的希腊大师的学说。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诸社会的创造者和改革者，不断涉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个遥远的宝岛，从中获得一些构成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原则的基本材料。因此，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因岁月的流逝实际上已十分悠远，但西方知识界对他们从来不陌生。现代西方的每一代人都曾发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是有用的，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一些关键问题密切相关。换言之，西方政治思想不仅溯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且还主要依赖希腊时代的这两位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家所留下的遗产而吸取营养。

如果人们考虑到现代西方人与这两位希腊思想家相隔着漫长的时期，确切地讲，大约二千四百年，如果人们注意到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么，人们自然地会问：现代的人们究竟为什么对产生于这样一个古代社会的思想如此感兴趣呢？或者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与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共同联系究竟是什么呢？的确，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够着手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思想。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政治思想家，仍然使人感兴趣，因为他们著述的目的，现代西方社会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自己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极其敏感，在自己的政治著作中，十分关心地开出一剂良药以医治他们社会衰落的危机。实质上，他们生活在亟待寻找一条出路、充满危机的社会，这就是使他们与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家非常接近之所在。自从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欧洲社会没有摆脱危机，这种危机的实质在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永远不可能做到公平对待一切人。这种危机始终没有消除，处于这种情境，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主要关注于试图调和基本上势不两立的社会政治矛盾，以保证一种所谓的表面和谐。在做这种工作时，他们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很大的启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指出在分崩离析的社会中，怎样才能最妥善地保证和谐和秩序。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巨大的力量源泉。

其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精通令人信服的论辩技巧，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们无论说什么事情，都不带有先知的那种确信无疑的结论，而是努力论证他们所探讨的事物。在培育这种技巧方面，他们自然很明显地遵循他们的直接先驱——智者学派的哲学家已经确立的传统。但是智者甘愿听任他们的推理自然进行，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善于熟练地把自己的推理导向他们所预想的结论，就此而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方法是优于智者的。后来历代政治思想家都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了我们称之为有目的的思考这种卓越的技巧，而且他们发现这种技巧非常有用。于是大多数西方政治思想家都有意或无意地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

家。

再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本质上把政治问题视为人的道德问题。他们谈论某些社会的、政治的制度，不过只着眼于人的道德发展。在他们重要的政治著作中，他们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单纯的生活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生活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重要的不是因尘世的必需品而兴旺的单纯生活，而是善的生活，即富有道德幸福的、有成就的生活。这种在较高的道德水准上阐释政治的企图，自然使他们以一种总体性的意义来超越政治的特殊性，而这种总体性的意义则构成哲学的本质。因此，他们用哲学来处理政治问题。在道德战线上，借助于哲学武器进行政治问题的论战，这种传统对著述于欧洲中世纪之后的西方政治思想家来说，非常有用。中世纪以后，随着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出现，欧洲迫切需要给这个新的社会体制提供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对此任务，整个中世纪神学所提供的政治思想观点都已无能为力，因为它不适合逐渐增长的世俗社会的趋势。这就出现了一条豁缝。这条豁缝由仿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采取的以哲学的权威性，从道德方面论述政治的实践所弥平了。这样，在最初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的基础上，欧洲政治哲学便日臻形成。

当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政治思想家，彼此之间是很不相同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曾经就读于柏拉图学园达二十五年之久。他俩各有不同的论点、不同的一套假设和不同的论证方式，甚至不同的文体风格。然而，他俩之间还有广大的共同基础，足以把他们归为一类。这种相似性的产生，实质上在于他们的政治著作所回答的问题无疑是相同的，尽管在结构上有着许多差别，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却为同一目标所制约。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生于雅典，他的一

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和工作在那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年至公元前 322 年）也是如此。但是他与柏拉图不同，就出身来说，他不是雅典人，他生于希腊东北部，马其顿边境的一个小城镇斯塔吉拉。尽管他俩都曾经周游过希腊的其它地方，并且获得了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广博见识，他们自然思考那个时代所有城邦国家的共同问题，但是雅典城邦国家当时的状况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著作的观点。要确切地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必须概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城邦国家的状况。

到公元前 600 年，希腊民族已经能够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特性。他们常常为他们不同于其他民族而引以自豪，鄙视其他民族是野蛮人，而视自己为优等的希腊人。然而，他们是一个为千差万别的地理环境所分割开的民族，没有意识到民族性，尤其是缺乏一种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希腊所需要的友善关系。因而，在希腊本土及相邻的海岸、岛屿上产生了许多作为自主的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城邦国家是不足为奇的。这些城邦国家都是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城市，靠奴隶经济而兴旺繁荣；它有自己的神祇和女神，即一个地区的宗教，以其国家统治形式的频繁更替为特征，并且与毗邻城邦完全脱离。在这种环境下，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频仍，这种战争不必要地消耗了人力和资源，侵蚀着这些城邦国家的力量。

公元前 550 年左右，波斯战争爆发，这种两败俱伤的战斗才告停息。面临波斯人的屠杀，希腊城邦国家感到需要借助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以统一行动。这场战争主要在海上打了五十年的仗，最终挫败了波斯的入侵，并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最高领导，随后出现雅典的黄金时代。这时，主要由于消除了波斯威胁，雅典海军达到了全盛时期，她的力量越过了大海，把她

的商业和贸易扩及到地中海和黑海的大部分地区。雅典的艺术和文化也获得了最辉煌的发展。尤其是，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所创立的民主制兴盛起来。伯里克利领导了雅典民主制达十五年。这期间，雅典在每一方面都占有希腊世界中最重要的地位。

但是后来，公元前 431 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和雅典双方陷入残酷的战斗中。公元前 404 年这场战争结束时，人们发现和平与胜利都化为乌有。雅典最后忍受了这场战争失败的耻辱，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她的商业和贸易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她的资财消耗殆尽，她的盟主权也被统统砸碎。这场战争形式上的胜利者斯巴达的状况也不妙。她不得不为在反对雅典的战争中确保获得波斯的支持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了获得支持，斯巴达接受了波斯最不平等的条件，现在为了解除这些不平等的条件，她又陷入与波斯的战争中，这场战争从公元前 396 年持续到公元前 386 年。虽然经过这场战争，她最后能够避免在波斯人手中蒙受耻辱，但是仅仅几年之后，公元前 371 年她又不得不卷入与底比斯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斯巴达的荣誉永远被埋葬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使雅典和斯巴达衰落，而且也标志着整个希腊世界的一个衰落时期的开始。这时，各个城邦国家彼此都开始干戈相见，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灾难。每个城邦国家还遭受严重的国内骚乱。叛乱、变节和敌意慢慢侵入每个城邦的日常生活。政府频繁更替，一种信任危机污染了整个气氛。而且，几乎每一个城邦中，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宽了，从而导致那些城邦寡头专制集团和民主制集团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每个城邦都进行着内部和外部的斗争，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很快消失，整个希腊呈现出衰退的痕迹。

象。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著书立说的。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雅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荣，雅典之外的状况也并不好些。所有城邦国家都处于衰退过程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政治思想家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城邦活力的迅速丧失使得他们忧心忡忡，他们真诚地期待着复兴。事实上，他们的政治著作，是试图建立一座拦洪坝，抵御那个似乎要湮没希腊繁荣的排山倒海般的衰退的浪潮。就此而言，他们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不是有知识的隐士毫无牵挂的消遣，而是社会严重危机的必然产物。不论他们的政治思想有什么样的局限性，毫无疑问，他们是具有高度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由于内忧外患威胁着城邦国家的生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城邦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他们的政治原则丝毫没有进行根本变革的迹象，他们把自己的想象局限在城邦国家的范围以内，思考不打乱现存的结构就能够牢固地建立起秩序与和谐的可行的方法。尽管目标有局限性，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着手承担任务，分析他们面临的问题时，却不能忽视某些基本事实。例如，他们不能忽视，在他们的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日益扩大的鸿沟。经济上的不平等伴随着政治上的不平等，表现了雅典社会的特点。雅典社会的人分成三个等级，奴隶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权利；侨民享有充分的社会和自由的权利，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公民垄断全部的政治权利。而公民又分成贵族和平民，他们彼此常常流露敌意，不断造成紧张气氛，削弱了政权的基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想在这种秩序的模式里进行激烈的变革，他们的目标是要在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中逐渐获得和谐，他们

企求采取道德方案来解决分裂，以便达到这一目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在他们的社会里，由支配那个时代的舆论的智者学派所发动的，强大的个人主义的哲学运动更加削弱了政治权威。智者学派哲学家不承认现存秩序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赞同授与每个人按照个人的信仰和经验而判断是非的最高权利。在他们的思想中，不存在固定的、普遍的和绝对的标准。换言之，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当他们根据那些严酷的事实看待国家时，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认为国家的职能是以强权为基础的，通过既定的政治秩序保障正义，本质上不过有利于强者而已。智者把揭露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空虚作为自己的使命。因此在他们的学说的影响下，对政治权威的挑战和敌意与日俱增。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到这种状况，感到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加强已经动摇的政治权威的基础，以改变人们的看法，使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受智者学派的煽动而对政治权威日益增长的不忠诚是愚蠢的。他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政治权威，从而成为高度一体化的民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旦做到这一点，即一旦整个社会处于更加牢固的政治秩序的庇护之下，城邦国家的繁荣就会失而复得。然而这需要非常令人信服的论证，而且在某些普遍的和绝对的原则方面，要抵销智者学派坚持这些原则的可能性的主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他们的思想与这个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

如果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事实上渴望医治患病的城邦国家，那么，在理论上，他们非常关注反对智者哲学家的论点。为了解除智者的威胁，他们从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获得很大的启发。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有一些重要的哲学含义，不仅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且后来大批的欧洲哲学家都受益于他。

数学作为论证演绎的论据，始于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数学知识不依靠经验观察，不过是通过纯粹思维，即无需感官的帮助而获得的。因此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设想有一种已经确立的知识，它在本质上是感觉之外的那个世界的东西。正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柏拉图在这样的信念的影响下，引伸出一种哲学，把知识看成是超越人的感觉世界的。其次，当然构成毕达哥拉斯数学的主要对象的数表明，它不受时间的有限性的限制。在这种数学的启发下，柏拉图开始确信永恒是可能的。第三，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依靠公理的，它为推理的过程打下基础，通过这种推理，人们能够从某些不需要验证的、自明的假设出发，获得可以验证的真理。柏拉图在他的理论中充分采用了这种运用公理的方法；他从一种先验的认识论径直走到政治学，他的政治学代表着一个可验证的现实世界。除去这些一般性的影响而外，毕达哥拉斯学说显然还塑造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具体的思想。毕达哥拉斯的理论把正义看成是一个平方数，即一个自身相乘的数。一个平方数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组成，它的部分的数目与每一部分的数值对等，这就揭示了一种完满的和谐。象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坚决根据这个概念认为正义涉及社会中彼此相异的因素的调整。再则，毕达哥拉斯的中庸论也是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根源。毕达哥拉斯在对音乐进行数学研究中发现，在六个基本音符中，只有中间的两个音符，即介于每端两组对立的音符之间的音符，有使音乐和谐的功能；以这种研究为基础，毕达哥拉斯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庸是最好和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和谐。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毕达哥拉斯的中庸的影响更为明显，他的伦理学中的中庸

之道的理论，不过是毕达哥拉斯观点的重述。最后，亚里士多德站在毕达哥拉斯的立场上，拥护中等阶级的统治。

二

《国家篇》^①是柏拉图最重要的一部政治著作。它使人们瞥见到他的哲学，表明他是怎样精细地在道德的地基上矗立起理想的政治社会的大厦的。虽然这个理想的政治社会在某些方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现实情况，但不过是乌托邦而已。现实的城邦国家没有一个接近这种理想的政治社会，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希望实现这种理想的模式，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柏拉图本人相信这种理想的国家能够真正实现。在《国家篇》中，柏拉图承认，他描绘的这种理想国家，即使不能达到，也还是有其用处的，因为现实的国家追求它，实际上能够使自身变得更好。正是由于柏拉图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国家，而这种理想国家的实践性是非常成问题的，所以，柏拉图的批评家们把他看成是一个幻想世界的漫游者，喜欢把他和亚里士多德相比较，认为后者还可以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种判断对柏拉图也许是不公平的。诚然，柏拉图怀有政治发迹的抱负，不过他的这些抱负都落空了。人们不应该认为柏拉图全神贯注于乌托邦是由于他在政治实践中受到挫折，便决意逃避现实世界。事实上，要解释他对理想社会的兴趣，最好用柏拉图一般的哲学观点，即所谓现实的东西只有依据超验的理想才能真正地为人所认识和理解。所以，为了清楚地理解他的理想社会，有必要领略一下他的理念论。

① 中文旧译《理想国》或《乌托邦》——译者注。

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是区分意见和知识。他认为我们通过感官感知的地球上的全部对象，都只是个别的对象，它们在本质上呈现出彼此对立的双重特性。就此而言，一个个别的对象，例如，一方面可以表现为美，另一方面能看起来丑陋。我们关于个别东西的认识不能称之为知识，因为从本性上讲，知识是确实可靠的，而对个别东西的认识是关于具有对立特性的对象的认识，就是说，它既如此又并非如此，所以，这种认识容易错误。为了把关于特殊对象的认识同知识区别开，柏拉图把关于特殊对象的认识称之为意见。我们周围的所有个别的对象受制于我们的感官知觉，整个感觉世界都是意见的对象。那么，什么是知识的对象呢？柏拉图认为，知识是确实可靠的，它的对象必然是如此的东西或存在的东西，即普遍的和永恒的如此的东西，而且它与意见的对象不同，不受制于人们的感官知觉。柏拉图把这种对象称之为永恒不变的、先验的理念或形式。他认为，这种理念或形式是真实的，与之相应的个别的对象只是这种理念或形式的不完满的表现，是不真实的，只是貌似而已。柏拉图作了一个说明：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看见的猫不是超时间的普遍存在的，它的生与死都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但是猫之所以为猫的理念是不会随着这种个别的猫的生与死而变化的。它是普遍的和永恒的，当然也不能被我们的感官所把握。猫之所以为猫的理念蕴涵着一个属于超感觉的永恒世界的理想的猫，我们在周围见到的所有的猫，却正是这个理想的猫的不完满的近似。

这种理念论的含意是说，不根据一种理想，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和总体的知识。由于这种理想毕竟是超越人们感觉之外的世界的东西，确实不能完全为人所把握。可是喜好洞察真理的哲学家必然密切注意这种理想，而不局限于个别性之内的转瞬

即逝的东西。他这样讲不是没有意义的。世间个别的东西都仅仅是它的理想形式的不完满的表现，要改善前者的任何努力都只能趋向后者而前进。因此，虽然柏拉图的理念论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但是，毫无疑问，它与社会政治进步的任何客观计划都是相关联的；它试图告诉人们，如果你们想要改善你们的现实制度，首先应该确定一个理念。由此看来，柏拉图的乌托邦决不是浪漫空想家的无意义的演习。

由于智者怀疑社会正义，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把解决什么是正义的问题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的确，在思考自己正义理论的过程中，他勾画出理想政治社会的轮廓，他认为这个理想社会将作为消除社会弊病的指导性的模型。令人感兴趣的是，尽管柏拉图着眼于国家问题，但他不是从国家生活着手讨论正义的问题，而是相反，他从个人生活开始，探询什么东西给人的生活带来善和正义，然后论证国家生活不过是个人生活的放大，进而讨论国家生活中的正义。这样分析比较方便。柏拉图基本上是以大量的个人道德问题为外衣，开始论述政治问题的，显然，他清楚地暗示我们，他倾向于从道德方面论述政治学。

为了确定国家生活中的正义，柏拉图设想了一种理想社会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中，正义将能够发扬光大。他构思了一种理想的城邦，包含三个自由民等级：工匠、武士、监国者。柏拉图认为，这种等级划分是合乎自然，合乎道德的。为了说明它决不是个人武断想象的产物，而是在一系列自然的事件中完全能够出现的，柏拉图描绘出他的理想城市得以展开的情况。柏拉图表明，天有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物质上的需要，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的。每个人的天资都与其他人不同，一个人只能适合一种而不是许多种职业。因此，个人为了